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孔明安 刘振怡/译

我们时代 革命的新反思

[英] 恩斯特·拉克劳 著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Ernesto Lacla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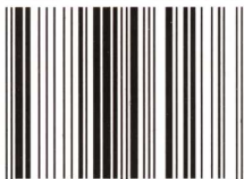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ISBN 7-207-06927-8



9 787207 069276 >

ISBN 7-207-06927-8/B·253

定价：25.00 元



——我们时代—— 革命①的新反思

[英]恩斯特·拉克劳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黑版贸审字 08-2002-02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英)拉克劳著;孔明安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7-06927-8

I. 我... II. ①拉...②孔...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593 号

责任编辑:魏杰恒

装帧设计:李 梅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之一 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

[英] 恩斯特·拉克劳 著 孔明安 译
刘振怡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 1/2
字 数 220 0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927-8/B·253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策划/尹树广 主编/衣俊卿

孔明安 刘振怡/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科研基金项目

恩斯特·拉克劳 是一位政治理论家,曾经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牛津大学,从1973年开始在艾塞克斯大学政治系授课,并且一直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以及多所拉美大学的访问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NLB,伦敦1977年),曾经发表过多篇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文章。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科研基金项目

策划:尹树广

主编:衣俊卿

编委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立群	孔明安	尹树广	衣俊卿	刘振怡
李久军	李文方	李秋零	陈春江	郁建兴
赵敦华	赵林	柯锦华	姚大志	黄惠珍
韩东晖	靳希平	鉴传今	霍桂桓	魏杰恒

译丛总序

20 世纪末的最后 20 年是中国哲学理性异常活跃的时期,我曾经从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几个主要方面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进展。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1980 年代关于真理标准、人的主体性、传统文化的命运、传统哲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更新等一系列大讨论,1990 年代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经济哲学、公共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技哲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界的空前活跃和繁荣。然而,“热点”的频频出现和快速更替、新领域的相继开出和转换、新术语的不断涌现和流行,在推动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开掘和理论的厚重建构。

令人欣喜的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我们在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看到了某种“学术回归”的迹象。其标志之一是学术研究的心态开始走向平和与深沉。从对宏大的理论框架的追求转向细微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的深度探索。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开始把积淀多年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一些深度的、厚重的学术著作。其标志之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和学术交流开始成为可能。如果这两方面的发展趋势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希望回归到本真的

哲学形态,即文化批判层面上的批判性的对话和反思活动。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和东西文化之争,1980—90年代又经历了逐步的对外开放,并且在世纪末汇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并没有开展起来。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包含许多层面。一般说来,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化全球化的进程相对快一些,以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足球、牛仔、卡通等消费文化符号为标志的大众文化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并很快形成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间的共处格局。然而,理论层面的真正的跨文化的交锋和交流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一下,就不得不承认,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相对封闭地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各种学术和理论思潮。无论是对西方思潮不加区别地一律冠以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加以彻底拒斥和无情批判的年代,还是以我们固有的理解框架对国外各种思潮和理论加以剪裁并批判地借鉴的年代,甚至在普遍进行翻译、介绍和研读的对外开放的年代,我们与国外学术界实际上保持着一种单向度的“独白”的状态,常常是既未进入西方学术思想的语境和文化关联,也没有进入西方学术界的视野,更谈不上直接的对话、交流和交锋。在国际学术领域,我们往往自我“边缘化”。

基于对上述情况的清醒认识,目前中国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开始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直接的、同时代的、近距离的、甚至面对面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并通过一些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一些有远见的期刊的海外原创性学术论文的刊发,特别是通过对同

时代的国外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的新著的高水平翻译和文本解读,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在这里选译当代著名理论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关于国家、民主、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著作,包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著1985)、《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拉克劳著1990)、《民主的悖论》(墨菲著1996)、《批判的国家理论》(巴罗著1993)、《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雅索普著2002)等。此举的宗旨也是推进一种直接的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的确立。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所选取的几位当代理论家和思想家,大多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相关,至少具有“家族相似性”,并且受到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的深刻影响。当然,任何“命名”都注定是残缺的和不完备的,并且具有误入歧途的可能性。重要的不是“命名”,而是这些理论家的深层的共同关切,他们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方式关注困扰着我们时代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现代性的机制、基础、命运、困境和未来。而且他们共同代表着当代西方学术界中传统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之间界限的消解,深刻体现了理论的批判本质和开放性特征。记得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随着阿多诺、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萨特、弗洛姆等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巨星相继陨落,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开始。但是,在二十世纪后20年,一方面是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一代领袖人物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野,并且积极同后现代主义等当红理论思潮展开开放式的批判性对话,另一方面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向马克思“致敬”或与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积极对话,以及詹姆逊、吉登斯、拉克劳、墨菲、波德里亚等兼有后现代色彩和“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理论家向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加盟,这些在我们面前又展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地平线。

因此,翻译和解读这些同时代的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一,有助于我们打破哲学研究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的僵硬的学科壁垒;其二,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各学科之间更大范围的交融和相互开放,从而能够真正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语境,在深刻的文化批判的含义上开展真正的国际学术交流,同时,在这种交流中确立我们的话语权;其三,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研究走向深化。我们发现,这些思想家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并没有停留于宏大的叙事方式,没有仅仅从学理层面挖掘现代性之根基,而是像福柯的微观政治学那样,在社会机制的各个层面上反思现代性,这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现代性的命运,并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的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翻译工作常常是异常艰难的,而又是“出力不讨好”的劳作。考虑到译者自身学术功底和语言能力的局限,这种困难就更加明显。好在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最难得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对话,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的劳动都不会是徒劳的。仅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开辟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一种可能的途径,有助于发扬哲学的文化批判和开放式对话的本性。

衣俊卿

2003年1月26日

中译者序言

多元激进民主理论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的“新”政治纲领,它标志着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正式宣告了其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事实上,自 1985 年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出版之后,西方学者就对这一左派思潮给予了诸多评价,赞同和批评之声纷至沓来。之后,他们二人撰文对有关的批评做出了回应和答复,并就《领导权》一书所涉及的一系列有关重要问题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的背景及其有关内容。因此,就重要性程度而言,即将出版的中译本《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它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哲学流派的特征呢?通过对他们有关著作的解读,我们试图从“解构”与“建构”这一方法论路径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杂合了当今现代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思潮,并在摒弃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概念范畴的基础之上,试图重构其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正如拉克劳自己所言:“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

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①因此,解构基础上的建构(或如拉克劳自己所言的“发展”)就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方法论特征。追踪这一具体的“解构-建构”过程,则成为我们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试图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做一简析,期望它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一、破碎的主体与主体身份的认同

自西方近代以来,主体始终在哲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20世纪之后,近代哲学这一高昂的主体,却不断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20世纪的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都是对传统主体理论的颠覆和瓦解。同样,在这一点上,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也毫不例外,它具体体现在他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革命主体的分析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肩负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和全人类的解放,等等。但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之末看来显然是不合时宜了;导致这一主体破碎和变化的,正是时代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否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拉克劳说:“我们深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变化的不只是实际存在的而且

^① 拉克劳、墨菲,2003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序言。

还是本体论的。全球化问题和信息社会问题在控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其次是自然主义的)之内是不可想像的。”^①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现实之间,在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挑战面前,在战后资本主义对“劳-资”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福利等措施的影响下,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已经变得不再是一个统一的集体或联盟组织,而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名词范畴。导致这一变化的正是由于原先作为工人阶级统一性基础的阶级利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们认为,科技革命和时代变迁使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充满了多样性、差异性,并由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所构成的社会。因此,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肯定会发生分裂,而作为阶级构成统一性的基础必然发生断裂和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元主体,不同利益所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伴随的逻辑结果自然就是多元主体的出现,这一多元主体构成了他们所提出的“新”社会主义的主体。所以,“新”社会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而是以多元主体“认同”为基础的“新”社会。这是一个充满了不同话语,多元差异的社会。它不再简单地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它还应当包括妇女、第三世界的移民、学生和同性恋等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这是一个由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所组成的多元结构的社会,一个不断产生着新“对

^① 拉克劳、墨菲,2003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序言。

抗”的社会。而在这一新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理应有其自身的地位和“新”的使命,那就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这是全球化格局下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

因此,对工人阶级及其构成的消解,必然导致对“阶级”这一普遍范畴的彻底肢解。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完全是一种本质论的、决定论的和还原论的概念,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革命导致了阶级这一普遍性概念的式微和崩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各个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出现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所以,近代哲学主体概念的瓦解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其逻辑推演环节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被消解得支离破碎的传统主体如何规避相对主义呢?拉克劳和墨菲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主体’范畴,我们都是在话语结构内,都是在‘主体身份(subject positions)’的意义上而言的。”^①因此,身份(position)一词成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新引入范畴。这一点,拉克劳在本书第二部分致南非学生阿尔特的来信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作为主体预先构成的统一性的‘阶级’范畴,对它的拒斥并不意味着对主体的绝对排斥,而是主体的历史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相信你最后所提出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具体性问题失去了其意义……因为如果把阶级斗争视为与其他人的具体的斗争,那就会预先设定一个被建构的分析领域,即要认识到主体身份的碎片化和分散

^① E. Laclau, C. Mouffe, 1985, p. 115.

性”。^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拉克劳和墨菲并非对“主体”一词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但却一定要对之加以解构,使之历史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重新进行建构。他们之所以把“主体”规定为“主体身份”,当然是有其缘由和苦衷的。一方面,作为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主体都有其自身地位及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主体范畴,在拉克劳看来,显然是近代哲学的本质主义的产物,是建立在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必然性基础之上,它并不能随手拿来为其所用,而且也与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社会主义策略背道而驰,因此,对主体这一概念加以解构和改造就成了某种必然。当然,纵然使用这一概念,拉克劳和墨菲是一定要避免其本质主义的痕迹,所以,他一再强调,他所使用的“主体”一词,是在两个条件下应用的,首先是必须在他们的“话语理论”体系中,这是其不同于传统主体性理论的根本所在。其次,这一范畴的所指并非传统主体,而是“主体身份”。因此,“身份”一词,或者说“主体身份”,就成了拉克劳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也是其激进民主政治纲领的核心概念。如此,拉克劳和墨菲就从传统工人阶级主体的解构过渡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建构。

这一建构的结果就是“链接(articulation)”概念的提出。链接是在差异(difference)与认同(identity)基础上而实现的。由于主体的瓦解和破碎,又由于从主体到主体身份的过渡,因此,在不同差异的主体身份的基础上重新建构

^① E. Laclau, 1990, p. 163.

新的身份认同,就具有了某种逻辑的基础。当拉克劳和墨菲运用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方法来打碎“主体”,并试图用“主体身份”一词取代“主体”时,他显然也同样遇到了后现代社会中各个不同“身份”的沟通问题。为此,破碎了的主体就被还原为不同境遇下有差异的“身份”;而具有各个不同身份的行为主体,必然要经历一个确认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主体身份在不同的状态和利益下所进行的相互之间的联合或“链接”,但这一链接却不再是本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固定的阶级之间的坚强联合和联盟,而是随时变化,并不断地重新组合,以达到其政治斗争的目标。所以,从破碎的主体到主体身份的认同过程,就是一个对传统本质主义的主体的消解和建构过程。经过这样的一番理论努力,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主体既去掉了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痕迹,又逃脱了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难以规避的相对主义之嫌,从而为其“激进民主”的政治目标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或担当者。所以,“身份”和“主体身份”概念的提出,就成为某种克服“主体”破碎状态,在新境遇下寻找新的团结力量的逻辑必然。这一逻辑最终导致了其建构“认同”政治的“领导权”策略。

至此,我们可以说,对“阶级”范畴的消解,从“主体”到“主体身份”,从“差异”到“认同”的“链接”,决不是简单的概念范畴的变化,而是拉克劳和墨菲二人苦心孤诣的努力结果,其背后实际包含了他们对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吸收和改造。当然,至于具体的吸取和改造过程,我们就不在此详述了。